

本社·编著

一千年前的 哲言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社・编著

二千年前的

哲
言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千年前的哲言

(社会版)

本社编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插页 6 印张 7.75 字数 116,000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11,001—31,000

ISBN 7-5325-2339-X

B·286 定价: 10.80 元

序

樊学平

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而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建立起与新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观念形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

“不能设想,一个没有强大精神支柱的民族,可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江泽民总书记这一科学论断,既揭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也指明了这种建设的必由之路:马克思主义作为继承

和发展人类思想文化一切有价值成果的结晶,对于新观念形态的建立自然有着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而同时,任何民族、任何时期的思想文化体系都不是无本之木,它必然要以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生长的养料。适应新时代经济基础的新的观念形态,必然是马克思主义与本民族文化传统精华之完美结合。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具有五千年悠久且深厚的文化传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为立足点,批判其封建性的糟粕,汲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之必需。

活跃于二千多年前的先秦诸子,奏响了中华文明的序曲。他们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大背景中百家争鸣,以探究人的生命价值为起点,以追求理想人格为目标,以谋求各人在社会和谐中的恰当责任为归宿。不难发现,他们卓越的智慧中闪耀着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光芒,他们所倡导的理想人格与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也有不少契合点,正是这些思想,铸就了中华民族的主体精神和主流文化。因此,批判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必须正本清源,从先秦时代做起。

由市委宣传部、市教委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共同组织编写的《二千年前的哲言》一书,以邓小平理论为指针,以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为研究方法,通过缜密的排比,系统地再现了先秦诸子睿智的思想精华,适应了社会和时代的需要,是一本兼具思想教育和知识熏陶双

重作用的好书,它不但是青少年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良好教材,同时也可以作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提高道德修养、增益思辨能力的有益读物。我有幸与问此事,特为之序。

1997年11月25日



凡 例

一、本书辑选先秦哲人语录 561 则,编为三部分:《修养篇》表现人格铸造和自我修养的道德规范;《行为篇》显示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行为准则;《思维篇》介绍先秦哲学中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精华。三篇按内容主题各分成若干专章,每章内按本章内容的内在联系,分若干层次。除在章前作简要的题解外,并在每一层次后殿以提纲挈领的小结,题解、小结与卷首绪论构成全书纲领,共同作为导读。

二、各则语录的译文采用直译的方法,即反映其产生之时的原创意义。鉴于部分先秦哲言在流传和运用的过程中,其内涵或解释已发生了约定俗成的变化,因对某些不能尽意或较难理解的译文,以及易于产生误解的通假字等,酌加按语补充说明。

三、本书对难字、僻字进行注音,多音字仅标注其

在该语录中的场合读法。

四、本书语录采自以下 20 种先秦著作：《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孝经》、《左传》、《国语》、《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管子》、《荀子》、《孙子》、《晏子春秋》、《墨子》、《商君书》、《韩非子》、《吕氏春秋》、《楚辞》，版本均取用我社出版的各种整理本或白文本。书后附有语录索引及对上述各书的介绍，以便查阅和进一步研究原文。

绪 论

—

在走向 2000 年的时候,我们编选了这本 2000 多年前的先哲语录,这决非是发思古之幽情。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将伴随着思想现代化的进程。然而如同经济建设已经证明了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这场宏伟事业的必由之路;思想现代化,在今天的中国,也必然以辩证唯物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为指针。同时,也必然是“中国特色”,亦即民族化的过程。

“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恩格斯致施米特的信,1890 年 10 月 27 日)。辩证唯物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作为迄今为止人类思辨的最高结晶,人类精神的最高境界,同样是由前代的思想资料为前提的;作为一种普遍真理,一种人类的共同的理想人格,也必然在任何时

间任何地方,都会有所体现。因此中国古代人生哲学与思辨哲学,也必然会含有与之同一的成份。发掘这种成份,古为今用,使辩证唯物主义教育与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具有“中国特色”,切合中国国情,不仅是思想教育的当务之急,也是建设适应新时期经济基础的民族新道德体系,与使辩证唯物主义中国化的必不可少的思想材料准备。而从先秦时代做起,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同前)。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与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经济结构演变以及随之发生的政治的、法律的等等变化,积渐地对发轫于先秦时代的思想材料发生间接的与直接的影响,在丰富、发展它的同时,也扭曲、销蚀了它。而愈到封建社会的中后期,扭曲、销蚀的成份越大。因而,近现代人所认识的古代人生与思辨哲学,许多已不复先秦时代的原貌。正本清源,拂去岁月的尘垢,还中华哲理以其原初的面貌,便是批判继承古代这一笔文化遗产,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发掘其民主性的精华之第一步工作。这项工作的严密的理论梳理,当然有待于理论界长期的努力;而撷其英华,对阅读者作一个概略的介绍,则无疑会有利于加强思想与文化教育的中国特色。因此,我们这本小书,由先秦做起,而以语录的形式出现,以便当代人能够直接与 2000 多年

前的哲人对晤，体悟他们精微的原创思想，在潜移默化中，加强道德品质的培养与哲学思辨能力，同时也提高自己的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

二

先秦，是中华民族的初生与发育时代，时至春秋战国时期（前 770—前 221），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与社会的巨变，提供了哲学思想生成发展的最合适的土壤，从而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盛况。当时主要的学派有儒、道、法、墨、兵、名、农、杂、阴阳、纵横诸家，其中儒、道、法、墨四家，以其理论的完整性、独立性影响最著，被称为“显学”，出现了孔子、孟子、荀子（以上儒家）；老子、庄子（以上道家）、墨子（墨家）、韩非子（法家）等大师巨匠，而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实践中，体现古代唯物论与辩证法思想最出色的，更有兵家的孙武，杂家的吕不韦以及堪称兵、法先驱的大政治家管子等等。

先秦哲学的辉煌，是在极其现实的人生舞台上展开的。围绕着社会转型、中国统一，与人应如何适应纷争的时代这三位一体的问题，诸子百家，以济世的情怀，摩顶放踵，奔走四方，或运筹帷幄，决策千里；或守善独处，授徒讲学。无论出处进退，都不遗余力地推行自己的学说，既相互驳诘，又相互吸纳。在思想与思想的无数次碰撞中，深化着对人生问题的解悟，即使是以

避世完身为宗旨的庄子，骨子里也包含着对多难人生的世故却又睿智的洞察。

对同一中心问题的百家争鸣，固然因理论体系的构筑，而不免各执己见，有所偏颇；却也因着不同角度的契入，而扪摸到了真理的方方面面，更因着自立于不败之地的信念，在相诘中互补，将真知的火花发扬光大。特别是当他们将各自的学说，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去时，更往往能不断地修正学派的偏见，从而促使各派学说薪尽火传，在回归现实的过程中获得深化。

因此，考察诸子百家的哲学，不仅应看到各派的得失，更应从总体上把握这一时期哲学的精神实质；不仅要理论层面解析，更应充分注意它的现实性、实践性。只有这样，才能探求到作为中华文明渊藪的这一时期的思想光华。这也是这本小书在编纂宗旨上的重要特点。

三

由于人生问题，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各种复杂关系的总和，因此不同于西方，中国哲学，一开始就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当作一个和谐的整体来研究。至春秋战国时期，所谓“天人相应”的古老命题仍然是哲学的中心问题。但是由于其主体承担者已从王官之学转化为诸子百家，因而表现了崭新的时代特色。

诸子百家是当时新兴的、充满朝气的士这一阶层

的理论代表,其强烈的自尊自信与自觉的济世拯民的现实理想,使“天人相应”冲破了夏商以来“天”为有意志的人格神,及君权神授的樊篱,而表现出一种理性的智慧与一种趋于向上一路的强烈的主体精神。以将天视作“自然”为基点,以人的主体精神的觉醒为核心,“天人相应”观,形成了新的品格与理论架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观念上,即:天道自然观、新的天人相应观、顺天得中观。

所谓天道自然观,是说天地万物是自然生成的,天即自然,天道即万物的自然本性,它生生不绝,依自身的规律终始变化而无已,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所谓新的天人相应观,是说人既是万物之一,更是万物之灵,是与天地并列的三才之一(儒家),或是与地天道并列的四大(道家)之一。所以,人虽不能干预自然规律,却能够“参”究万物之理,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前提下,获得对人生问题,乃至人生价值的主体把握,从而由必然走向自由。虽然对这种把握、这种自由,各家的观点不同,甚至相反,但是在强调主体精神,强调人的尊严、价值方面却又殊途同归,即使看似消极避世的庄子,其实质也在于一种不为物拘的向上的精神超越与自尊自重。

所谓顺天得中的观念,是天道自然与新的天人相应观的逻辑发展与实践运用。“中”的观念由来已久,又称大中,中道。对“中”的具体解释各家虽不同,但从

“中”与“大”与“道”相连称可见，中是大道。先哲们直观地觉察到万物都由对立的两方面构成，并相互转化，而处于流动变迁之中，形成新陈代谢，其中有一种并非显性呈现，却确确实实存在的自然之理，亦即客观规律。相对于矛盾的两端，这自然之理就是中。庄子将它比作人身脉络系统中处于中要地位的督脉，称“缘督以为经”，是对中道的最形象而贴切的比喻。《礼记·中庸》开宗明义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自然所赋予的叫作天性，循天性而行叫作道），则是对循天得中观最简明的理论总结。

如果说天道自然观与新的天人相应观，从客体与主体两方面显示了先秦哲学中富于辩证意味的唯物论因素，那么，在二者基础上生发的顺天得中观，尤其是它在种种实践活动中的表现，更显示了中国古代辩证法的民族特色。由于中——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蕴含在事物发生发展的矛盾运动过程之中，因此，得中，必须在左右、上下、过与不及等矛盾的两端中寻求相对合适的度，必须在复杂的矛盾运动中寻求中道的运动态势，必须根据不同的时间空间条件考察中道的变化形态。本书思维篇把这些归纳为中庸之道——过犹不及、因势利导、执经通权，三个渊源有自的命题，而贯穿于其中的则是人在知行合一的实践中的高昂的主体进取精神。“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战国时期吸取各家之长的儒家大师荀子在《天论》中的这句

名言,最鲜明地体现了富于辩证法与唯物论因素的先秦思辨哲学的这种向上的精神。

四

诸子百家以天人关系为中心的上述思辨成果,深深地渗透到他们的人生哲学之中,使之同样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性格。

透过各家的异说,可以见到一种共同的民族精神。各学派都把人性视作与天性相通的,从而把通过自我修养或自我约束、去恶向善、完善人性,看作是顺天而行,反之,则是逆天而动;都把中正信直看作人性之中道,而反对放僻奸邪;从而更把能在道德上顺天得中,达到至善至美者推为能最充分发挥主体精神的“圣人”(儒家)、“真人”(道家)等等。不仅如此,各家还有一些共同的道德标准,如敦厚真诚、勤俭朴实、谦虚好学、坚毅乐观等等,而所有这些标准又都围绕一个中心——不企求非分的物质享受,崇尚精神的净化;克服私欲,推崇大公;指向一个目标——通过各安其位,达到社会的和谐安定。总之,先秦人生哲学的共同的本质精神是在社会的总体和谐中来评价人的价值,它以自我修养或自我约束为发轫,而以在一定社会地位上实现自我价值为归宿,是一种自我修养、约束与自我实现相统一的哲学,一种自尊、自爱、自律、自强的人生哲学。

而由于以天人关系为基础,因此更焕发出一种自觉向上、昂扬恢廓的主体精神,后来被儒道二家共同奉为经典的《周易》中的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这种可贵精神的集中体现。

诸子百家有关道德修养的理论,体系最为完备,对民族精神影响最巨的不能不推儒家。虽然这个体系有它固有的弱点,比如,它的道德本位观念的先验论倾向,它的重精神、轻实践的偏颇,特别是它那维护封建秩序的终极目的等等。虽然这些弱点越到封建社会后期越益显露,而使这一体系失去了先秦时的奋发向上精神;然而作为恩格斯所说的“思想材料”,只要去除其封建性的糟粕,至今仍足可借鉴。其中最重要的是孟子的“养气持志说”,与《礼记·大学》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由自我修养到自我实现的知行合一的道德观。如果今天我们把“格物致知”——穷究万物之理,发明人心中的良知的头足倒置的认识论颠倒过来,改造为在深入实践中(格物),不断加深对事物客观规律性的认识(致知);如果我们去除“养气持志说”的“性善论”因素,把它改造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大志,培养人的浩然正气,那么这个修养体系的合理内核便精彩顿现:这就是,以养气持志、守节持操为根本,以羞恶之心与是非之心为枢机,以谦虚好学、勇毅乐观、勤俭朴实、求真求美为砥砺,以义利之辨为准绳,加强自我修养,并且推己及人,协调

个人与家庭、集体、国家的关系,形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风尚,促成安定团结局面的形成。当然这一修养过程是建立在以实践为基础、知行合一的哲学基础上的,这些也就是本书修养篇、行为篇(可视为道德上篇、道德下篇)的编纂思路及其与思维篇的相互关系。

